

以对科技文化和政策的深度认知增强竞争力

2020年冠状病毒疫情肆虐全球。近日，在由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二十国集团（G20）虚拟峰会上，各国领袖普遍认为，我们已进入一个长期与病毒共存的“后疫情时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在抗疫过程中，我们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得好和国民纪律性强的国家，抗疫效果就比较明显，疫情所带来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新加坡和中国两国政府，一方面积极抗击疫情；另一方面努力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继续稳步推进各项重大政策，确保国家战略和重大创新不会受到影响。两国政府毫不例外地都把工作重点之一放在发展数字经济上，尤其是以区块链和金融科技为代表的一系列前沿科技领域的创新。

我们注意到，近来各国对于传统中心化的数字经济，都开始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试图缓解或避免出现垄断和“赢者通吃”的行业架构，例如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近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新加坡和中国都在大力发展非中心化的新型数字通证经济（Token Economy）所必需的基础设施。通证就是可流通的加密数字权益证明，把实体世界里的各种资产和权益通证化（Tokenisation），就可以创造一个更包容、更普惠、更有效率的通证经济。

有的读者会问，看以前的报道，在中国进行各类通证包括加密货币的交易都是违法的，为什么还要大力发展通证经济的基础

设施呢？新加坡业界的认识是，“没有通证的区块链就不是真正的区块链”。这个认识看起来和中国存在显著的差异，其实刚好相反，它说明了新加坡能深入解读中国国情、文化与科技政策的微妙，加以配合并发挥本身在数字经济领域的优势，为新加坡创造机遇。

首先，通证是公有区块链的重要激励机制。近期全球通证市场上的确存在利用通证，进行过度投机的浓厚气氛。近日比特币不断急速上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最近通过建立新法或修改旧法，已经相当全面和完整地覆盖了虚拟资产（Virtual Asset）和数字通证，及时有效地监管抑制了过度投机风气。

中国严厉禁止通证的发行与交易，就是为了防范在这个领域内的过度投机，避免再次出现像P2P（指不同网络节点之间的小额借贷交易）过度投机那样，给普通民众带来重大财产损失，并对社会造成伤害。

一刀切的政策虽然看起来缺乏弹性，但是不得不承认，它立竿见影，迅速有效。这会扼杀创新吗？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将只发展不需要激励机制的私有（企业）区块链呢？完全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组建全球公有链或联盟链框架，来部署区块链服务网络（Blockchain-based Service Network），打造全球性第二代智能互联网的网络。

新加坡在公有链和联盟链领域的系统优势非常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新中两国能够存异求

同，尊重彼此之间在区块链与通证政策上的差异，双方都将着眼点放在这些认知的互补性上。再看新中两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新加坡的乌敏岛计划（Project Ubin）专注于国家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结算和批发业务；而中国的数字人民币（DC/EP）将重点放在零售业务上，解决商业和民众数字支付需求，这种零售电子支付甚至可以是离线进行的。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充分的互补性。今年6月，金管局局长孟文能在上海的陆家嘴论坛指出，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新中两国可进行深入的合作。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也可以延伸到海外市场，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近日就提议，新中两国的数字支付合作，可以从零售业务起步，然后考虑把成功合作模式复制到亚细安甚至东亚。

有互补就一定有一致性，“区块链是为人民服务的”，因为它的内置平衡机制，可以用来创造更公平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新中两国的认识又是高度一致的。发展数字经济，除了网络和系统基础设施，法律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至关重要。在近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在新中两国的一致推动下，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得到协定的确认，数据存储策略也有利于分布式账本，这将大大加速新中两国在亚细安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在重大的创新领域，战略和竞争优势不仅仅是来自成本和技术方面的商业竞争力。我们对于行业科技文化和政策的深入认识也是至关重要的。从上面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的优势，不但来自于完善健全创新的监管架构，而且来自于对各国科技发展和政策语境的有效深入解读。

这种理解“和而不同”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新加坡如果仅仅从政策的字面含义上，认识中国对于通证基础设施的理解，就有可能错失中国由外而内、有序地部署公有链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和商业机会。又如在数字货币领域，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担忧和竞争。

新加坡大多数的新技术创业者技术专长优势明显，政府也通

过各项计划为企业提供大量的支持与资助。但是在交流中，我们发现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更进一步提升对科技文化与政策语言的解读能力，以便深入正确地理解他国政策的真正含意。企业家在理解中文技术语言和金融科技文化方面，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亚洲将是“后疫情时期”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中心。为了充分利用亚洲地区的商机，我们的

大学科技与商业教育系统，应该更倾向于理解亚洲各国的国情、语言和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越南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和技术文化方面的认知要特别精通。

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提前布局，进入战略蓝海，获得先发优势，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企业在技术和商业模式等方方面面的综合优势。

作者白士洋是新加坡李白学院院长，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
李国权是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金融科技与区块链教授
闫黎是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战略系高级讲师

